

韩琦 著

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



「跨文化研究」丛书 78

「法」金丝燕 董晓萍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法] 金丝燕 董晓萍 主编

“跨文化研究”丛书 (75)

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

韩 琦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 / 韩琦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202-0476-7

I. ①康… II. ①韩… III. ①科学思想—传播—研究—清代
②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清代 IV. ① G30 ②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6338 号

责任编辑 程广媛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969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0 千字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02-0476-7

定 价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作者像

作者简介

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Annals of Science* 编委，*Historia Scientiarum* 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1582-1793)》《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等，合著合编有《中国印刷史》《中国活字印刷史》《〈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发表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康熙朝欧洲科学的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在康熙时代，法王路易十四派遣许多传教士来华，清廷科学活动频繁，编纂了大型历算著作《律历渊源》。然而康熙皇帝却将科学作为皇权的工具，用以控制汉人和洋人，仅仅满足于颁历授时、预测天象的实用需求；“御制”历算著作长期深锁宫中，没有得到及时传播；康熙晚年提倡“西学中源”说，与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多有关联，导致复古思潮的兴起。这一时代的科学活动未能使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化。作者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呈现给读者，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跨文化学理论与方法论”
(项目批准号: 16JJD750006)

综合性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敦和学术基金

资助出版

“跨文化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乐黛云 [法] 汪德迈 (Léon Vandermeersch) 王 宁 程正民

[法] 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陈越光 李国英 李正荣

[法] 金丝燕 王邦维 董晓萍 王一川 周 宪 赵白生

[英] 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法] 劳格文 (John Lagerwey)

[爱沙尼亚] 于鲁·瓦尔克 (Ülo Valk) [日] 尾崎文昭

总 序

“跨文化研究”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汉语与民俗文化研究”的综合性成果，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执行，由承担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教学任务的中外学者撰写。

跨文化研究事业发端于北京大学，奠基人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乐黛云先生，乐先生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专业的开创者，以往中国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大都集中于这个领域。在法国，由新一代汉学家金丝燕教授领衔，开拓了跨文化、跨学科和跨文本的学科建设。北京师范大学近年开展的“跨文化学”学科建设之不同，在于将这门吸收世界前沿学问并提倡平等对话的学科向中国学术文化领域全面推进，同时也让中国历史文明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通过跨文化的桥梁，公之于世，进行对话和交流。这种学科转向是经过长期准备的。

四年来，乐黛云先生、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金丝燕教授、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和民俗学家董晓萍教授等联袂投入，将跨文化研究由文学门类，推向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语言文字学、民俗学和科技史学等主要使用中国思想材料研究中国学问的领域，使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化学学科建设整体关联的理论付诸实践。令人欣喜的是，中外学者对此一致响应，现在陆续出版的这套丛书，正是各国教授共同努力，从各自以中外不同视角长期从事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中，精心提炼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提供砖瓦，也期盼中外高校跨文化学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本项工作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长期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敦和学术基金提供了出版资助，谨此一并致谢！

“跨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8年8月28日

前 言

跨文化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则是其中的重要课题。受法国学者裴化行、荣振华等人著作的影响，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就对中西交流感兴趣，特别关注利玛窦以来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博士期间选定康熙时代作为研究的时段，迄今正好三十年。要研究这一课题，如不能阅读当时的一手文献，就无法做出一流的学问，于是我开始了法文、德文、日文和拉丁文的学习。1989年，在北京教授拉丁文的只有德国《华裔学志》主编弥维礼先生，那时听讲的只有四位博士生。我们每周到北京师范大学弥先生的寓所听课，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康熙时代是满族文化、汉族文化和西洋的欧洲文明

交融的时期，在异域文化传入和接纳的同时，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抵触，科学的传播和接受（日本学者称为“受容”），其情形也十分类似。要深入理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要考虑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诸因素的关系，还应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视野出发，对东亚各国（中国、朝鲜、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予以比较，才能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跨文化传播，哪些要拿来、照搬，哪些要舍弃或扬弃，哪些要加以汇通，只有通过比较才有辨别。即使拿来，也需要足够的勇气，要面临保守派的反对。明末时，士大夫采取了南宋陆九渊“心同理同”的说辞，很好地减弱了反对的声音。崇祯历法改革时，徐光启采用“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此观点至乾隆时仍被清廷所采用）的策略。到了康熙时代，盛行“西学中源”说。这种学说的流行基于中西科学的比较，特别是对传统历算典籍的解读，这也是康熙时代《周髀算经》受到重视的原因。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皇帝、皇子、满汉大臣，乃至一般士大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不同时期，士人对西方科学、宗教的态度转变，和政治、学术思潮的关系，都值得深入探讨。康熙帝重视西学，影响远播，

对乾嘉学术，特别是历算考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促进了科学从宫廷向民间的传播。清代知识的传播和生产，应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乃至思想史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才能有更全面清晰的认识。

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得到了诸多前辈的鼓励和帮助。就跨文化研究而言，我要特别感谢张隆溪教授。张先生是比较文学的大家，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对跨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主张要有开阔的眼光和胸怀，要超越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由精深而至于博大。2001年，为纪念利玛窦来京四百周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张先生来信邀我参加，可惜因时间冲突未能与会报告。2002年12月，又蒙张先生的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七个月，才得以亲聆教诲，并拜读了他的许多著作，获益匪浅。其间，我与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同室，得以时时请益，实为平生快事。

业师杜石然先生博学多识，精通日语，兼通英、俄等多种语言，游刃于哲学、文学、科学和历史之间，一直以研究通史相期许，也多次以此相告诫。贯通中西，打通时代，疏通学术史的脉络，乃是自己多年来学术追

求的所在和努力的目标。虽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但离自己的期望还相距甚远。

在此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如果没有她的热情邀请和鼓励，这本小书是无法短期内与读者见面的。董教授是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我与她的研究领域相去甚远，因此之前交往不多。由于各自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都有合作，在会议与讲演中能够不时碰面，因此结缘。2017年9月18日，承蒙她好意邀请，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从凡尔赛到紫禁城：康熙时代法国科学在宫廷的传播》的演讲。之后又蒙她的盛情，参与“跨文化研究”丛书的写作。思之再三，就将上述演讲作了扩充，并相应收入其他三篇有关康熙、耶稣会士和科学传播的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它也凝聚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心血，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我也期盼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对康熙时代欧洲科学在宫廷的传播史作一系统、全面的总结，以飨读者。

韩琦

戊戌春于海淀新科祥园寓所

导 言

康熙帝（1654—1722）是清朝入关后第二位君主，他八岁登基，在位达六十一年之久。他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勤奋好学，崇儒重道，编纂群书，几暇格物，学贯天人，尤为古今所罕觐，文治武功，屡为史学家所乐道。康熙时代大致与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相近，通过耶稣会士，欧洲科学和艺术传播到清廷。有清一代皇帝中康熙帝最具政治眼光，无论与俄国或与教廷的交往，他都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作为满族君主，如何协调满汉矛盾，以达到降服汉人之目的，也成为为政的首务。科学作为皇权的重要工具，康熙不仅自己学习西学，还让皇三子胤祉组织设立蒙养斋算学馆，编纂《律历渊源》，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终其一生，他善待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采用“用其技艺”的国策，对清

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历代帝王中，康熙对西学的喜好格外引人注目。在杨光先反教案结束之后，无论是东巡、南巡，还是平定噶尔丹，乃至到避暑山庄狩猎，都有传教士陪侍在侧，得以随时征询历算和外交诸问题。检视现存的各种官方文书，如起居注、实录、上谕、奏折，乃至御制文集等等，凡涉及康熙帝有关西学和西方宗教的言行，我们都应放到当时更广阔的背景中去审视，参考传教士的书信档案和士人文集，中西文献互证，才能更深入理解康熙一言一行的动机和背景。

17、18 世纪，耶稣会士是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主体，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从欧洲带来了数学、天文学、医学等知识，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耶稣会士之所以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怀有“愈显主荣”的信念，把科学作为重要手段，探究自然、考测天象，以此来证明上帝的伟大，因此科学在他们的活动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康熙时代，法国耶稣会士所起的作用则更为重要，有的担任帝师，传授西学知识；有的被任命为钦差与谈判大使，肩负外交重任；有的还充当御前学者，参与宫廷著作的编纂，身兼数职，多才多艺。

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南怀仁时代，即从 1669 年杨光先反教案平反之后，一直到 1688 年南怀仁去世的近 20 年间；第二个时期是从 1688 年南怀仁去世和法国“国王数学家”初来中国，到 1722 年之间的 30 余年。第二个时期是整个清代中西交往最为辉煌的时期，又可以 1713 年（康熙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算学馆为标志）为界，再细分为两个阶段。

近 30 年来，笔者访问了欧美等二十余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收集了中西科学、文化和宗教交流史方面的大量文献，一直尝试从全球史和跨文化史的视野，通过中西文献的互证，重新审视康熙时代科学活动的历史，试图从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诸方面加以分析。本书所收录的四篇文章，就是这方面探索的成果。有两篇分别发表在台湾的《清华学报》和《汉学研究》上，发表以后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一文，力图综合社会、政治、学术、宗教诸因素，对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讨。作为研究案例，文中透过对 1689 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发生的观测老人星事件

的分析，来说明李光地失宠的诸多因素，并进而分析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对历算抱有浓厚兴趣、聘请梅文鼎传授数学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赢得康熙的宠信；又结合李光地的为人、性格，分析他再次聘请梅文鼎的原因、在沟通康熙和梅文鼎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以阐明清初科学活动的运作机制。文中的素材和观点，被《清初士人和西学》一书大量采用，并被其他学者转用，还被《皇帝的新数学》（*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一书作为专章进行了改写。《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试图对“西学中源”说的发展脉络重新加以考证，通过对康熙时代《易经》研究背景的考察，论述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的传教策略、《易经》研究与康熙提倡“西学中源”说的关系。此文也被国内外研究《易经》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多方征引，相关史料和观点甚至被《历史研究》同类论文所采用，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另外两篇《从凡尔赛到紫禁城：康熙时代法国科学在宫廷的传播》和《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分别发表在《法国汉学》和《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前者原题为《“格物穷理院”与蒙养斋：17、18 世纪